

蓝

袜

子

丛

英国卷

自己的一间屋

黄 梅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自己的一间屋

(英国卷)

黄 梅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尹世民

封面设计：宁成春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陶 洁 钱满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平 宁 瑛 申慧辉 孙美玲

孙桂荣 李 琛 吴正仪 劳 人

张 容 张瑞安 段若川 陶 洁

高慧勤 钱满素 黄 梅 蒋承俊

蓝袜子丛书

自己的一间屋

黄 梅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张 352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9.30 元

ISBN 7-5434-2416-9/I·211

前言

黄 梅

本书选收了二十九位女作家的四十二篇(首)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主要是英国的作品,但也兼收了其他一些国家——如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等——的若干英语文学创作。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兼收并蓄是个权宜的作法,是为了使在本丛书中未能独立成卷的国家的优秀妇女文学得到一定的反映。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英帝国数百年的扩张,这些国家的文化与英国和英语文学传统有很深的纠葛。把这些作品收在一起,也可以说是多少地揭示了一种历史形成的状况,并使读者对当今英语文学的后殖民的“地貌”多一些感受。

入选的英国作家又以20世纪的为主。此前的作品也选了一些,但并不系统。几位一流大家,如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等,反而没有收入。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对她们的介绍多一些,她们的著作已经比较广为人知。如本书附录所表明的,《简·爱》或奥斯丁的某些小说已有了数种译本(节译本),中国读者想了解她们的作品是较为容易办到的。此外,她们所擅长的长篇不太适合收入这样的文集,也是我们终于割舍的原因。这后一

原因也使几位当代重要作家也未能收入。有些名家——如艾丽丝·墨多克(1919—)和安尼塔·布鲁克娜(1943—)等——几乎只写长篇,难以选得适当的短作品;而且其长篇或是寓意相当深奥复杂,或是构建十分微妙精致,似乎也很难节选一段而又做到传达原作神韵。顺便说,这两位作家也没有被选入很有些影响的《诺顿妇女文选》(1985),不知是不是由于同一缘故。

无论如何,就我们的本意,是想增进读者对早期英国妇女文学的了解并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本世纪的状况。但由于时间、篇幅和编者能力的局限,难免有遗珠之憾。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的批评,也期望今后有更好的选本出现。

我们的选本从阿弗拉·班恩开始。

当然,在此之前,英国妇女写作已有许多年了。古代的口头文学姑且不论(如今我们已很难确定,古代民间歌谣中有多少是由摇篮、纺线纱的妇女传唱出来的)。至少大约到了乔叟的时代,就开始有妇女写的文字流传于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女作家”,如诺威治的朱丽安(1342—?)和玛吉瑞·坎普(1373?—?)都是所谓的“宗教异人”。她们都弃绝了世俗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神的事业,用本地语言记述神的启示和训喻,以及自己的精神历程。这恐怕从反面映证了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时期里,过“正常”生活的妇女没有条件从事写作。吴尔夫说,即使到了文艺空前繁荣的伊丽莎白时代,妇女也没有受教育和择业的权利,经济不能自立,婚姻不能自主,纵有莎士比亚的天才和勇气,也只能落得含怨葬身于荒郊野地。^①虽

^① 此处及后面提到吴尔夫的地方可参看本书选收的《自己的一间屋》的片断。

说吴尔夫对当时情况的了解远不如现在全面深入，她所描画的图景大致没有错。但是事情也不是绝对的。16世纪里毕竟也有少数上层社会的知书达礼的女性星星点点地留下了她们的文字。那个时代借以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是其中之一，她的个别诗作常出现在某些权威的诗集（如牛津英国诗选）里。此外还有当时以文化保护人和翻译家知名于世的玛丽·锡德尼·赫伯特（1561—1621，名诗人锡德尼的妹妹）等。除了她们，一定还有不少没有留下名字的中上层家庭的女儿们由于相对安定富裕的境况，也由于本土英语文化的繁荣和成熟，获得了识字读书的机会，并多多少少地试笔涂鸦。她们没能成为莎翁式的天才，但也并没个个都夭折在异乡。正是她们为下一个世纪准备了成批量的女性读者和作者。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17世纪那些纷纷浮出水平面的女作者和女诗人。

的确，在17世纪里女诗人已不再只是凤毛麟角了：除了吴尔夫提到的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纽卡瑟尔公爵夫人，1623—1674）和温奇尔西伯爵夫人（即安妮·芬奇，1661—1720），还有许许多多名气不那么大的女性在染指于舞文弄墨。入选杰梅恩·格丽尔主编的英国17世纪女诗人诗文选《亲吻棍杖》（1989）的作者就有五十名。考虑到当时的英国人口大约只是现今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也就相当可观了。当时的诗人并不如浪漫主义时期以后那样得人尊崇，他们的身分多少类似艺匠，生计有赖于有地位的保护人，因此他们写很多的歌功贺喜的应景诗（虽然未必违心）。女性写诗人也不例外。她们还写了大量的私人诗，如怀念亡夫的悼诗，给女儿的遗言（对当时的妇女来说，每一次分娩都是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因此要留遗言的机会很多）。婴儿的高死亡率使得丧子之痛成为常常出现的主

题，其中深切的悲哀恐怕的确是唯有母亲才知的。如看到流产胎儿时的惊与悲：“这算怎样的生育啊；那被鄙弃的可怜东西？/小小的胚胎，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又如婚后多年方得的孩子满月不久就死去：“我才刚刚看到他，他已消逝，/我刚刚触到玫瑰花蕾，它就凋残；/……泪水是我的缪斯，悲痛是我的艺术，/你的挽歌是撕肝裂胆的哀哭。”她们还留下了不少“精神日记”，记录信仰的历程，如果说震撼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在她们的诗作里有任何反映的话，便是体现于这种宗教关怀。总之，尽管和弥尔顿或马维尔相比，她们仍是装备不精良、诗艺欠高超的“游击队”，但已的确不可完全忽略了。因为有这许许多多的写作活动，才终于有了班恩。

班恩是英国的第一位职业女作家，她为后来者拓出了一条道路，提供了一个先例。她是17世纪的总结，18世纪的前兆。从她叙事时的从容、调侃时的大胆和坦露心迹（据她的某些诗歌和私信）时的直白主动，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勇气和成熟，而且见证了一代妇女登上舞台、抛头露面的历史机遇。的确，除了演戏，写作也许是妇女最先进入的现代职业之一。而这又是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密切联系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圈地运动等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方面妇女被挤出了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使中产阶级妇女成了装点门面的闲人，同时教育的某种程度的普及（笛福和斯威夫特都曾对妇女教育发表议论）使她们乃至一些女工女佣都已能够读书。于是社会就这样准备好了新一代的读书人和写书人。不仅如此，社会还提供了新的有利于女性的出版机制。正是在这一时期里，过去靠贵族庇护的文人们转而投靠

到新兴书商的麾下，这给在家庭中活动的妇女提供了靠笔挣钱谋生的可能。于是，18世纪涌现了“大批的女作家”。^①

在某个意义上，18世纪妇女的文学活动在其广度和活跃程度上甚至超过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从坚信男女平等、建议单身妇女脱离男性监护创立自己的半公社、半修道院式的生活共同体的女权先驱玛丽·阿斯泰尔（1666—1731）到肆无忌惮地炮制畅销故事的“臭”名昭著的海伍德太太（1693?—1756）；从能引得蒲柏等诗人倾心爱慕又能泼辣地和他们对骂的文笔机敏展畅的贵妇玛丽·渥特利·蒙塔古夫人（1689—1762）到为约翰逊博士等文化人提供了活动空间的著名沙龙女主人史雷尔夫人（1741—1821）；从一批被人称为“蓝袜子”的通晓外国语和古典文学的女学者到以伯尼为代表的成就可观的小说家，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的大潮中写出了划时代的《为女权一辩》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纪的女作家们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她们中有的在为稻粱谋，但也不乏人为艺术本身、为更充实有趣的人生乃至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写作。我们收入的弗·伯尼的书信片断虽然只记述了几个附庸风雅的浅薄上层女子，却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女性写作是何等的时髦，何等的“火”。如果说日后19世纪的英国女性大约是因为更熟练更精巧地掌握了某些文学样式而在文坛上占据了较显赫的一席之地，那么在18世纪里，由于小说等现代文类尚在草创，由于文理分工尚不明晰，也由于新资产阶级女性的理想形象仍在探讨和塑造过程中，妇女参与“码字”（借一个当代中国语汇说）似乎有更大的随意性和自由空间。比如，18世纪里似乎有更多的女人

^① 詹尼特·托德：《女权主义文学史》，路特立支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写诗，甚至包括不让须眉地写刻薄犀利的骂人诗。又比如，中年以后靠编故事养家糊口的小说家夏洛特·史密斯夫人（1749—1806）除了同时写诗和游记等以外，还出人意料地写了一部《鸟类史》！

在英国，就女性创作而言，19世纪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它给我们留下了奥斯丁、布朗宁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克·乔·罗塞蒂等以往传统“正册”文学史也不能忽略的闪光的名字。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与此同时，妇女逐渐较多地进入了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概括听来很平淡，但如南丁格尔^①所揭示的，每一微小的变化都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无数饱含甘苦悲欢的尝试和探寻取得的。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1867年改革议案提出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发表了《论女性的被奴役》（1869），指出了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排挤和压迫。当然这时尚不能说穆勒的开明观点已被多数人接受，但它们的正式提出无疑标志着在资产阶级政权的框架内的妇女权利问题已经按部就班地提到了日程上。在英国，妇女于1918年获得了部分的选举权，1928年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

我们的选本不能直接地反映上述或其他争取妇女权益的历史过程；也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全面地反映英国妇女数百年的写作史。如前所述，我们基于种种考虑割舍了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又因将本书定位于侧重文学，没有收录一些在社会

^①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1820—1910）：享誉世界的护士和医疗改革家。她青年时代写的文章集《卡珊德拉》记录了她从一个富家小姐成长为一名职业女性的艰难精神历程。

历史中有重大意义的女权主义政治经济文献。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选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北欧书简》，而没收录她的著名的《为女权一辩》。也是因此，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以艾默莱恩·潘克赫斯特（1858—1928）等为首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为妇女选举权而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的时候，而我们收选的一些大致出自这一时期的小说和诗歌，只是间接地和潘克赫斯特们的活动相关。

这或许与编者个人的私心偏好有关。和哲学或政论相比，文学作品更接近外在世界和小人物的人生经验的本相。这多少有点像蔬菜瓜果与维生素的关系——也许对特定目的而言前者不及后者精练高效，但却更丰富更美味，而且带着一方土地的气味，甚至凝含当年气候的特质，每每给人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比如说，人们读《北欧书简》时常被作者的诚挚清新的文笔深深打动。有时她的观察和思考和她的女权主义主张一脉贯通，也有时她只用笔简洁地勾描如诗如画的异国田园。如果考虑到该书成书的时候，作者刚刚目睹了一场历史上空前伟大也空前惨烈的大革命并正在经历极痛苦的个人危机（事实上，北欧之行后她和男友的关系就彻底破裂，她曾试图投河自杀），我们不能不对她宁静婉约的笔调感到惊讶。她不无幽默地坦认自己关于黑暗的专制德国的先入之见可能需要调整；她怀着母亲的哀愁（而不是斗士的愤怒）忧虑着幼女的命运（那姑娘日后结局的确很悲惨）；她用明澈的关切目光扫描着旅途的一切。从这里我们能感受一种不会轻易被压垮的精神力量和一种真正坦荡的襟怀。我们会爱上她，“原谅”她不时流露的小小的自怜。又如内奥米的《远方的斯特拉》，这也许是本书中最不见著经传的作品。因为内奥米已远非大名鼎鼎，而她所撰文纪念的那位曾在中国

生活了很多年、写了许多畅销小说的斯特拉更是早已被人忘却了。而且，构成文章主体的往来书信应是信笔之作，并未私下打算好要传之久远。尽管如此，当斯特拉幽默地谈到马的“职业”与牙痛症的矛盾时，会令人哑然失笑；当她三言五语地描述奇异的日本舞者和醉哭的“落难”白俄时，栩栩如生的形象如在眼前。她们谈论时局，谈论文学和彼此的作品，用相互的友谊和关切濡沫对方。所有这一切，也许说不上伟大崇高，但却真真切切是前人留下的雪泥鸿爪，指示着一种追求，一种修养，一种尊严，一种可敬的人生境界。内奥米说，如今斯特拉已经被遗忘了，我们又何必写作呢？但也许，人类精神积累的林海中这些人迹罕至的幽径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偶然到此的漫游者面对星点的野花、带露的青草怦然心动，有所感悟？

6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组成部分，女权运动再度升温。在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以伊·肖尔沃特、桑·吉尔伯特和苏·古芭^①等为代表的强劲的女权（或称女性）主义思潮，致力于重建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挖掘被排斥于经典之外的以及被完全埋没的女性作家、剖析作品所反映的与男权对峙的女性思想和经验等。随着女作家的作品进入学校教程，各种妇女研究中心纷纷设立，并和出版业中的“妇女热”相呼应，出现了“妇女文学”的提法。这些自然都是争议的话题。70年代末以后，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及其追随者们兼收拉康、德里达等的思想，批评“早期”美国女权主义缺乏

^① 她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和《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当时影响颇大的代表作还有：帕·斯派克斯的《女性想象》（1975）和爱·摩尔斯的《文学妇女》（1976）。

理论基础，忽视对语言和文本的分析，是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意识中讨生活，其“主体”观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本身应被破除。与此同时许多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则指出，不存在什么抽象划一的“妇女”，原有的妇女研究中忽视阶级、种族、时代的差异，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向，等等。更何况，女性的作品是否足够“独立”，有没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能构成一个“传统”，还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然而，不论倡导“妇女文学”的人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活动有怎样的偏颇和局限，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事出必然，有深刻的根源和不可抹杀的建设意义。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绝大多数是父权（男权）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迫害；文化和语言本身贯穿着男权意识；以往讲述人类活动的种种的历史（包括文学史）也都排斥或忽视妇女及其活动；这些在今天几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出现“妇女文学”说的社会语境。不论“妇女文学”是否有永恒的价值，是否能成为“科学”的范畴（它也许不能也不必），它是我们的文化现在以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所必须要补的一课。

而且妇女文学确实别有特点，常常体现了明确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题。在17世纪，女人们刚刚拿起笔，就已在思索社会派定的角色——思索母性和婚姻等等。简·巴克尔（1652—？）的《贞女》讨论了女性独身的可能及其积极的作用。萨拉·菲奇（1670—1723）则在诗中抨击“虚妄的习俗”和“无聊的，过分的规矩”，对于自己的笔被限于抄录食谱等“有益主妇持家的事体”而深感愤懑，表示：“我的无畏的笔将更勇敢地冲击，/……不被治理女人的精妙制度所约束。”此外，妇女对同性别的作家常常分外的敏感和注意，如奥斯丁可以说是全面地继承了

伯尼的成果——从主题、构思、笔调直至有的小说标题。说至今为止的女性写作相对自成体系，构成一种与文学主流既密切相关，又有明显区别的亚文化，当不为过分。

女性作品的自身价值涉及两个相关的方面，即我们常说的形式与内容。吴尔夫说，女人的价值观和主导的（男性）观点不同。的确，许多女性的作品是在明显地或潜在地提出抗议和质疑。如本书中的《萨拉热窝失恋记》对于“成功”和“爱国”的思考。又如，女作家常常在琐细的题材上倾注大量心血和笔墨，以致常有见识高超的人士认定她们“无聊”、“没意思”。《新装》和《重逢》等也许都可算入这一类。《新装》中的梅布尔神经兮兮，为一件衣衫而痛苦万分。这使我们想起果戈里笔下忧心忡忡的小公务员。小说中贯穿始终并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物品是镜子——梅布尔一直是在通过别人的眼看自己（虽然，镜子所象征的势力是相当复杂的，并不能简单以“男权”概括^①）。该小说的主题与其说是女人的衣服，不如说是人和塑造人的“镜子”的关系。《重逢》与此有基本的相似之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一颦一笑、一装一饰的强烈自我意识，可映见叙述的自我意识，并折射出另一种无处不在的审视目光。实际上，作品恐怕包含了对被写的内容（即西方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叙事的方式乃至那审视目光的好几重的“议论”。读者唯有不仅读到该短篇蕴含同情的缜密的写实描绘，也读出其和婉深入的讥讽笔调，才能较全面地讨论该故事的价值。退一步说，如果有人认定琐事就是不足道，写琐事就一定“没意思”，

^① 近年女权主义批评中关于镜子意象的研究相当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对白雪公主的后妈的魔镜的分析。

这类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少值得一思：女人们何以就那么“无聊”呢？这种追问恐怕又会使我们回到和“镜子”相关的问题上。

即使只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凡对文学艺术稍许留心的人大约都能感到女人的述说方式和男人确实不一样。她们选用的词汇和比喻不同，采用的句型和思维的脉络（她们常被视为不可理喻）也多有不同。举个近在手头的小例子。前面提到的《远方的斯特拉》中的斯特拉把新潮的T. S. 爱略特们的创作称之为“腌胡桃”，而把自己的诗说成“果浆软糖”。这不仅是个清新俏皮的措辞，而且包含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态度和判断。对曾不断地向那些艰涩的现代主义大师朝圣的我们来说，这一富有女性色彩的比喻（可有哪位男士会如此说话吗？）难道不是别有一番滋味么。

坚持差别本身就是一种质疑。但质疑不等于否定。前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特别喜欢“颠覆”一词，仿佛一论说到对主导文化有“颠覆作用”便功德圆满了。但实际上，质疑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对话。对话是个新起点，也是进一步思考的一种方式。正因此才有必要“补课”或“纠偏”——因为在文化或文化史中压制或排斥女性声音，受损失的决不仅仅只是妇女。

当然，对各式各样的女作家们所表达思想和情感，我们要取分析的态度。吴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和《三个畿尼》虽然涉及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论其提出的问题，设想的对象，还是表达的方式，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中后一书刚问世时，另一位重要的英国女性评论家曾撰文尖锐地批评说，吴尔夫和她的听众大抵是“生来有五百镑岁

入的统治阶级妇女的女儿们”^①。读读本书中的一些短篇（如瑞斯和戈迪默的）就可以看出，一些置身于冲突中心的白人女性已深刻认识到，在现今世界中的女人们中间横亘着阶级矛盾、民族压迫和文化差异等等的巨大鸿沟。对此我们得有充分的估量。

在读书时，经验直接的共鸣、快感和顿悟，进行欣赏性的分析或批判性的思索都是哺育和养护灵魂的过程。从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说，这些优秀的女性作品都可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在今天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有关妇女的种种新老问题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一起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呼唤着关心妇女命运和全社会前途的人们思考并有所对应。一个较好的未来必定有赖于这思考。如果我们书中的这些作品能以某种方式多少地帮助读者面对今天，那么它们也就不枉这迢迢万里的“中国之行”了。

1994年9月于北京

^① 见《〈探究〉杂志重要文选》（纽约大学出版社，1964）一书中Q. D. 利维斯：《大英联邦的小虫们联合起来！》。

目 录

前言	黄 梅 (1)
阿弗拉·班恩 (1640—1689)	
武装的爱神	彭 予译 (2)
收场白——奎恩夫人的话	彭 予译 (3)
弗兰西斯·伯尼 (1752—1840)	
《伊芙莱娜》的作者	黄 梅译 (8)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759—1797)	
《北欧书简》(节选)	李素苗译 (16)
盖斯凯尔夫人 (1810—1865)	
克兰福德镇(节选)	韩敏中译 (33)
艾米莉·勃朗特 (1818—1848)	
追忆	彭 予译 (47)
囚犯	彭 予译 (49)
克里斯蒂娜·乔治娜·罗塞蒂 (1830—1894)	
亲爱的,我死后	彭 予译 (52)
蜘蛛网	彭 予译 (53)
上山	彭 予译 (54)
夏绿特·缪 (1869—1928)	

- 床边 黄 梅译 (56)
- 我心已跛 黄 梅译 (57)
- 维吉尼亚·吴尔夫 (1882—1941)**
- 新装 张 玲译 (60)
- 自己的一间屋 (节选) 王义国译 (71)
- 拉德克利夫·霍尔 (1883—1943)**
- 施瓦茨小姐 杨晓红译 (111)
- 伊迪丝·西特韦尔 (1887—1964)**
- 波尔卡 傅 浩译 (139)
- 华尔兹 傅 浩译 (142)
- 晨歌 傅 浩译 (146)
- 雨依然下个不停 傅 浩译 (148)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888—1923)**
- 洋娃娃的房子 王知还译 (152)
- 吉恩·瑞斯 (1890—1979)**
- 她们烧书的那一天 于晓丹译 (164)
- 丽贝卡·韦斯特 (1892—1983)**
- 不可解除的婚姻 蒋洪新译 (174)
- 多萝西·赛耶斯 (1893—1957)**
- 彼得·温西勋爵不可思议的私奔 张小娴译 (204)
- 内奥米·米奇森 (1897—1964)**
- 远方的斯特拉 于晓丹译 (235)
- 伊丽莎白·鲍恩 (1899—1973)**
- 减价品 张 玲译 (250)
- 斯蒂维·史密斯 (1902—1971)**
- 简单的活法 沈 睿译 (268)
- 累极而无言 沈 睿译 (273)